

论文献记载的唐宋诗真迹之价值

吕宛庭

(厦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唐宋诗人之真迹今多不传,且于普通人而言极难获取。但文人在诗话或笔记中所记载的唐宋诗真迹的相关信息,亦可成为富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唐宋诗真迹相关记载中反映的异文情况,不仅可给后世校勘提供便利,还能反映当时文人的辨伪意识。文献中所记载的唐宋诗真迹及其相关信息,对诗歌辑佚、文学史研究有重要作用。此外,真迹作为书法作品,自身也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价值。对唐宋诗真迹进行系统梳理,可为当今文学研究挖掘到更多新材料,探索更多新思路。

关键词: 唐宋诗真迹;文献;价值;校勘;辑佚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2)02-0191-08

Value of authentic works of Tang and Song poems in documentary records

LYU Want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Most of the authentic works of Tang and Song poets have not survived and are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ordinary people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entic works of Tang and Song poems recorded by the literati in their words or notes can also be valuable research objects. The divergent texts of authentic works of Tang and Song poems can not only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later collation, but also reflect the consciousness of authentication of the literati at that time. The authentic works of Tang and Song poems recorded in the literature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poetry collection and literature history. In addition, as calligraphy works, authentic works themselves also have a certain artistic appreciation valu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authentic works of Tang and Song poems may help us find more new materials and explore more new ideas for today's literature research.

Keywords: authentic works of Tang and Song poems; documents; value; collation; collections

真迹是保存文学作品原貌、反映作家创作心境的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除将其视为艺术品外,21世纪以来,愈来愈多的学者注意到了真迹在语言学、文学、史学、文献学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张显成认为简帛上的真迹具有极强的文献真实性,可为今世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研究及古籍文意解读提供帮助。^[1] 龚延明以司马伋、吕祖谦官告真迹绢本文书为依据,探讨了官员官告的格式、材质、形制等重要问题。^[2] 王峰认为容庚先生所藏之书法真迹,可以更加完整

地呈现中国碑帖书法的历史发展脉络。^[3] 肖鹏、王兆鹏编著的《重返宋词现场》一书也展示了欧阳修、张孝祥、秦观、姜夔等词人的大量真迹照片,以更好地复原词人写作时的状态,给读者更强烈的代入感。

对于唐诗、宋诗而言,真迹可表达诗作原意,体现作家性格,反映当时创作场景,展示时代整体创作风格趋向,并帮助后人探讨作品流传、存佚问题。然而,今虽存唐诗、宋诗数十万首,诗人之真迹则传之甚少。就唐代诗人而言,杜甫未留下真

迹,碑刻资料也未被寻得;白居易目前仅存一件残破的石经幢,但上面刻满佛经,非诗作真迹;李白的《上阳台帖》真迹只余25字,且真伪难辨。宋代诗人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留有真迹,却非常人所能亲见之物。不过,唐宋诗人真迹,虽于今多不可亲眼观得,但部分文人见诗人亲笔后,会将相关信息录于其笔记、诗话等作品中。此处需明确,唐宋诗人真迹,乃指唐宋诗人亲手写下的本人诗作,他人所抄之诗不可算作唐宋诗真迹。这些唐宋诗真迹相关的记载,虽只是文字形式,却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直观”地呈现唐宋诗的初始面貌。笔者现结合具体文献,梳理唐宋诗真迹在校勘、史料、鉴赏等方面所蕴藏的丰富价值。

一、校勘价值

唐宋人诗集传至今日,已有千余年。部分作品历经多次传抄、刊刻后,或字迹模糊,不易辨识;或异文旁出,难以确证。而若参照当时之人对诗人真迹的记载,则可发现校勘新思路,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如宋代吴聿《观林诗话》载:

尝见东坡手写《会猎》诗云:“向不
如皋闲射雉,人间何以得卿卿。”世所传
本乃作“不向如皋”,遂以为东坡误用如
皋为地名,特未尝见写本耳。^{[4]5}

经查,苏轼有《和梅户曹会猎铁沟》一诗,《东坡全集》(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钞内府藏本)、《永乐大典》(明钞本)、《历代诗话》(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钞浙江巡抚采进本)等明清二代较为通行的苏轼集或类书,皆将此句记为“不向如皋闲射雉”。据《观林诗话》所言,这些“世所传本”皆以诗中“如皋”为地名。吴聿曾亲眼见过苏轼此诗的手写本,因此其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若该说法为真,则结合下文“人间何以得卿卿”,可知苏轼此处之“如皋闲射雉”运用了《左传》中贾大夫“如皋射雉”的典故^①,以表“以才华博女子欢心”之意。其中如皋并非地名,而是作“临近水边”解。今观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苏东坡全集》,已将《和梅户曹会猎铁沟》中此句录为“向不如皋闲射雉”,并注明这一改动源自于《观林诗话》^[5]。

可见,文献中真迹相关的记载,对后世之人修改过去传本的错误,理解诗作本意具有重要作用。

因技术水平限制,古人诗文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漏。而另一方面,文人也可能出于主观意愿,对前人之作进行改动。有部分作品历经润色后,确实较前文更加出彩;然还有一部分改动者并不知晓原意,妄加增删,不仅无法取得良好效果,还使前人佳作“面目全非”。因此,除对误传情况进行纠正外,史料笔记中所载之唐宋诗真迹,也可作为反驳后人改动思路的有力证据。如南宋袁文就在《瓮牖闲评》中记载了一则“庸改”案例:

任渊解黄太史诗,改《磨崖碑后》诗
‘臣结春秋二三策’一句作‘臣结春陵二
三策’,引元次山《春陵行》为言,此固一
说也。然余见太史亲写此诗于磨崖碑后
者,作‘臣结春秋二三策’,诎庸改耶?^[6]

任渊年少时,曾从黄庭坚学诗,后作《山谷诗集注》。他在辑校、解读的同时,也依据自己的观点,对黄庭坚诗文作出了一定修改。《磨崖碑后》诗“臣结春秋二三策”一句涉及元结作《春陵行》的典故,因此任渊将其易为“臣结春陵二三策”。对任渊的改法、解法,袁文于《瓮牖闲评》中持部分肯定态度。之所以还有部分否定,是因为后者曾亲眼见过黄庭坚书于磨崖碑上的诗文真迹,其原文确为“臣结春秋二三策”。

在系统性的校勘活动中,真迹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唐宋诗人之集历经多次传抄、刊刻后,往往诞生诸多版本,校注之时,需广泛收集异本,罗列异文,详细考证。若能看到来源可信的真迹,则异文之字得到确定的可能性将大幅提升。李壁作《王荆公诗注》时,就多次引其所见王安石真迹为参考对象,一一指出书中异文。如其在《即事六首·其四》(先生善鼓瑟,齐国好吹竽。操竿入齐人,雅郑亦复殊……)后注:

介父真迹“鼓”“殊”二字与俗书不
同,盖“鼓”字本合如此写,世俗从支从
皮,皆非也;“殊”字亦然。^{[7]113}

① 左丘明《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贾大夫恶(丑),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驾车马)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矣!’”(左丘明:《左传》,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640页。)

又在《即事六首·其五》(商阳杀三人,每辄不忍视。亦均食君食……)后注:

章茂宪侍郎所藏真迹乃作“亦云食君实”。^{[7]114}

李壁乃南宋文人,与王安石相隔一定时段,但他在为王诗作注时,多处收集王安石的真迹,除上文所提“章茂宪侍郎所藏本”外,他还收得临川饶蒙家的石本真迹。如其于《送陈和叔》“昼寓墩砖常至夜”一句后注:

此诗有石本在临川饶蒙家,真迹‘墩’作‘榑’。^{[7]359}

如此多方参照,详列异文,既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王安石诗本意,又令此本《王荆公诗注》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还给后人提供了收集、整理、注释前人诗歌的参考范式。

由上观之,当今学者整理唐宋文人诗集,亦应在据善本录入之时,充分考虑历代文献对唐宋诗人真迹的记载,以裨补阙漏,更加真实地还原诗文本意。然纵是真迹,也有假托、伪作之可能,况诗作本人写下真迹后是否又自作修改,后人也难以知晓。因此,古人见真迹时,亦是小心辨识。不少文献提及古人对唐宋诗人诗作真迹的谨慎态度和辨伪意识,对今人校勘有所警示。如陆游《老学庵笔记》道:

晁子止云:“曾见东坡手书《四州环一岛》诗,其间‘茫茫太仓中’一句,乃‘区区魏中梁’”,不知果否。苏季真云:“《寄张文潜桄榔杖》诗,初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江边独曳桄榔仗,林下闲寻笋拔苗’。‘盛孝章’又误为‘孝标’。已而悟,故尽易之。”虽其家所传,然去今所行“亡”字韵殊远,恐传之误也。^{[8]42}

对于晁子止和苏季真有关苏轼诗作原文的言论,陆游认为,部分真迹虽乃家传,但观者之说法并不可信,恐为“传之误”。可见,唐宋文人在面对真迹时,已具有一定的辨伪意识。这也告诫今人,在面对唐宋诗真迹相关的史料记载时,不可尽

信其言全盘采用,而应仔细辨其真伪,细加考证,确信其可用乃采用。

二、史料价值

除可在字句校勘方面发挥作用外,真迹相关的文献记载往往还蕴含着丰富的史料价值。因诗人自作诗歌时,其真迹中的题跋、旁注皆对后人理解诗歌本意、探究诗人当时处境有所帮助;文人提及唐宋诗真迹时,通常也会写明自己见此真迹的时间地点及真迹上的其他信息。这些内容,无论是对诗人生平事迹,还是对诗歌史,都具有较高的补充意义。

(一)完善诗人生平及作品

黄耆作《山谷年谱》时,参考了大量黄庭坚真迹,如其中《送郑彦能宣德知福昌县》后注:

先生有此诗真迹,跋云:“吾友郑彦能,今可为县令师也。以余寒乡士,不能重之于朝,故作诗赠行,以识吾愧。元祐元年壬寅,黄庭坚题之。”今以岁月为次,移附于此。^{[9]254}

黄庭坚本人在真迹中标注的年份,在极大程度上方便了后人按时间顺序排列其诗。黄耆正是依据“元祐元年壬寅黄庭坚题之”,将《送郑彦能宣德知福昌县》移动至《司马温公挽词》与《古意赠彦能》之间,保障了其年谱中诗歌“以岁月为次”的准确性。同时,诗人真迹也可记录自身交往经历,写明诗歌创作目的,展现诗人当时创作心情。《山谷年谱》中记载的诸多真迹中,就有部分体现了黄庭坚诗歌的写作背景。

如《次韵几复和答所寄》后注:

先生有此诗真迹,跋云:“丁卯岁,几复至吏部改官,追和予丁丑在德平所寄诗也。”^{[9]262}

《颐轩诗六首》后注:

按家藏此诗真迹序云:“元祐四年正月癸酉。”又有与君素手书云:“颐轩诗久草成,以真不工,久未写去。今漫遣,不知可意否。”后题二十一日。^{[9]273-274}

对于那些资料匮乏的诗人,真迹记载,更可对其生平、居所情况有所补充。叶梦得《石林诗话》载:

余居吴下,一日出阊门,至小寺中,壁间有题诗一绝云:“黄叶西陂水漫流,蓬蔕风急滞扁舟。夕阳暝色来千里,人语鸡声共一丘。”意极喜。初不书名氏,问寺僧,云吴县寇主簿所作,今官满去矣。归而问之吴下士大夫,云寇名国宝,盖与余同年,然皆莫知其能诗。余与国宝榜下未尝往来,亦谩不省其为人。已而数为好事者举此诗,始有言国宝徐州人,久从陈无己学,乃知文字渊源,有所自来,亦不难辨,恨不得多见之也。^[10]

寇国宝之诗,今多不传,其生平可考之内容也甚是匮乏,而在上段文字中,作者记录了其亲眼所见的寇国宝题壁诗内容,并交代了许多相关信息,即寇国宝与叶梦得同岁(1077年生),传为徐州人,曾任吴县主簿,师从陈师道。观今人对寇国宝的介绍,亦多依托于叶梦得此条记载。这些与真迹一并记录的作者简介,不仅可补充宋代诗人资料,还可对后人研究陈师道及其后学有一定益处。

真迹相关的文献内容,还可能涉及诗人集中未见之诗,如葛立方《韵语阳秋》:

诸绅尝以亲制龟冠为献,坡受之而赠以诗云:“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协朋从生庆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钻七十二。谁能用尔作少冠,响屐耳孙创其制。君今此去宁后来,欲慰相思时整视。”今集中无此诗,余尝见其亲笔。^[11]

《葛延之赠龟冠》一诗,东坡集初不载,葛立方根据其亲眼所见的苏轼真迹,对此诗内容及背景进行了介绍。至清代,查慎行据葛立方所言,将此诗补入《补注东坡编年诗》中。可见,文献所记载的诗人真迹,可补充苏轼的生平交往经历,更对苏诗、宋诗辑佚有很大帮助。与此例相近,元代孟宗宝《洞霄诗集》亦记录了林逋集中未收的两首《宿洞霄宫》诗:

右二诗不见先生集中,乃得真迹于先生七世孙可山林君洪处,使人惊喜,如获至宝。呜呼!先生高才清节,照映千古,且又生长是邦,此诗又其用意之作,向微寻访得之,乃几至流落,甚可叹也。^[12]

其后,明代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清代厉鹗编《宋诗纪事》时,皆收林逋《宿洞霄宫》诗,他们很有可能参考了孟宗宝的记述。今人在考证诗人生平、收录集中未有之诗歌时,亦应关注历代文献中所记载的真迹,以此对诗人事迹及作品有更充分的认识。

(二)完善诗歌史

真迹相关的记载,还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相关的史料。如唐宋年间,多有题壁诗。今日壁上之字已了无痕迹,但不少题壁诗真迹被文人记入诗话、笔记之中。如陈岩肖《庚溪诗话》:

所至驿舍旅邸,留题壁间,亦多有可取者。见李仲南丙寅临安旅邸壁间一绝云:“太一峰前是我家,满床书籍旧生涯。春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又言建州崇安分水驿壁一绝云:“江南三月已闻蝉,麦熟梅黄茧作绵。料得故园烟雨里,轻寒犹作勒花天。”又吕叔潜大虬言镇江丹阳玉乳泉壁间一绝云:“骑马出门三月暮,杨花无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难度,宿处先寻无杜鹄。”三诗皆可喜,然皆不著名氏也。^[13]

上述诗歌未留名姓,可能仅是出于寻常读书人之手,但其文辞有诸多可取之处,也可被视作宋诗研究的着眼点之一。关于此类“不著名氏”之诗,周密《浩然斋雅谈》中亦有类似记载:

候馆墙壁所书,多有可纪者,予尝录数处矣。今复得贵阳池驿壁间语,云:“昨日雨,今日晴。前月小,后月大。君欲问百年,百年如此过。孰为辱,孰为荣。何者福,何者祸。山中多白云,莫教脚一蹉。”潭州四通馆梁间有云:“蜗角名,蝇头利。老天术何巧,以此役斯世。

昨日一替死,今日一替生。暗里换人人不悟,门前每日见人行。”是皆警世之辞也。^[14]

此一类诗虽表达多有乡野俚俗之感,然其“孰为辱,孰为荣。何者福,何者祸”“昨日一替死,今日一替生”等句,看似简单易作,实则颇富哲理。钱钟书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15]宋代写于墙壁上的民间诗语,也有内蕴理趣之处,的确可以反映当时创作风格的整体趋向。这些零散见于文人笔记、诗话中的诗歌真迹记载,或可对后人概括历代诗歌创作规律、总结诗歌发展史有一定帮助。

另有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

信州杉溪驿舍中,有妇人题壁数百言。自叙世家本土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职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婉娘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将死,乃书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状,恨父母远,无地赴诉。言极哀切,颇有词藻,读者无不感伤。既死,槁葬之驿后山下。行人过此,多为之愤激,为诗以吊之者百余篇。人集之,谓之《鹿奴诗》,其间甚有佳句。^[16]

这是今日少见的女性题壁诗相关记录,如今《鹿奴诗》原文虽不存,但“鹿奴”生前的恨憾可借由他人诗歌为后人知晓,并成为文学史上灿若星辰的一笔。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普通女子的家庭生活及其女性意识的觉醒。这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历史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 佐证诗歌传播与存佚

因真迹贵重,不少文人得名家真迹后,都悉心保存,甚加爱护。吴聿《观林诗话》有云:

盐官倪清,素宝东坡墨迹数轴,如护眼目。县官数以势力劫之,卒不可得,取试经行中语,自榜其所居曰“薄命佳人之馆”。^{[4]8}

这些被“护眼目”般珍视的唐宋诗人真迹,不仅为国人所藏,还为他国文人所见。如记录着朝

鲜时代使者来华见闻的《燕行录》中就有这样几条记载:

翁方纲……设笋酌酒,履苏、黄、米真迹与诸名士纵观之。^[17]

由城门入徐进士家……出示米元章真迹、《西旅贡夔图》、文王鼎、端州砚、玉鹭香烛之属。其中一书帖,即苏贤笔。^[18]

由上可知直至清代,许多文人家中还妥善保存着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唐宋诗人的真迹,并将其作为家中之宝,于异国使者来访时出示展览。这些记载,皆可为唐宋诗文传播及东亚文学交流提供史料支撑。

然而,尽管得到了如此用心的对待,因战乱频仍或保存方式不当,所藏真迹也恐会遗失或损毁。文献对相关事件记载,也可令后人看到唐宋诗人真迹流传乃至散佚的过程。周紫芝《竹坡诗话》中记载:

余家藏山谷《谢李邦直送喬云龙茶诗》,所谓“喬云从龙小苍壁,元丰至今人未识”者是也。用川麻矮纸作钅轴书,如拳许大,字画飞动,可与《瘞鹤铭》《离堆记》争雄。政和甲午,携以示李端叔。端叔和山谷韵,又用此韵作诗见贻,且跋其尾云:“元丰八年九月,鲁直入馆。是月裕陵发引,前一日,百官集朝堂,与余适相值,邂逅邦直送茶。居两日,闻有诗,又数日,相见于文德班中,为余口占。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隐出此诗相示,盖二十有九年矣。感旧怆然,因借其韵,书于卷尾。是日太平,久不雨而雨,黄昏月出,已而复雨。”绍兴兵至,姑溪诗帖两牛腰,并与山谷墨妙为之一空。^[19]

周紫芝曾拜于吕本中门下,他十分尊崇被称为江西诗派领袖的黄庭坚,并珍藏其《谢李邦直送喬云龙茶诗》真迹。黄庭坚逝世九年后,其旧友李之仪见此真迹,颇有感触,为此作跋。《竹坡诗话》中,周紫芝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又写明此

真迹在战乱逃亡时遗失。

张邦基《墨庄漫录》还提及了家藏真迹众多的“润州苏氏”：

润州苏氏家书画甚多。书之绝异者有太宗《赐易简御书》，宋玉《大言赋》《并名真戒酒批答》，钟繇《贺吴灭关羽上文帝表》，王右军《答会稽内史王述书》、《雪晴寄山阴张侯帖》，献之《秋风词》，梁萧子云《节班固汉史》，唐褚遂良模本《兰亭》，李太白《天马歌》，贺知章《醉中吟》，张长史《书逸人壁》，颜鲁公《进文殊碑读》，李阳冰篆《新泉铭》，永禅师《真草千文》，齐己题赠，并皆真迹。……后皆散逸，或有归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处。^[20]

虽这些“书之绝异者”后皆散逸，但此份记载，在某些程度上对考知前代诗文仍有一定作用。

以上内容证明，借由文献对真迹的记载，后人可推知诗人当时的交往人士，也可知真迹的后世存佚情况，这对古籍整理、史料收集皆有益处。

三、鉴赏价值

唐宋时期书法家辈出，因此唐宋诗人真迹不仅可在字句校勘和史料整理方面提供相关价值，其字迹本身也能够娱人眼目。历代文人在谈论唐宋文人真迹时，也常就其书写艺术发表评论，此中情感态度亦可成为今人的研究对象。

（一）可赏字迹

黄庭坚书法，常为今之学者称叹，其在唐宋之时亦受追捧。黄庭坚的真迹，今存《松风阁诗帖》《黄州寒食诗帖》等，学者评其“书法结体呈辐射式，用笔振颤激荡，笔法上强调起倒擒纵，在章法上以阻遏线条流向为能事”^[21]“风神洒荡，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意蕴十足”^[22]。前引周紫芝《竹坡诗话》，周紫芝认为黄庭坚作品“如拳许大，字画飞动”，可与陶弘景之《瘞鹤铭》、颜真卿之《离堆记》争雄，可谓评价极高。古今赞赏遥相呼应，黄庭坚行书之鉴赏与收藏价值于此间得到了进一步肯定。

又有欧阳修《六一诗话》载：

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其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书，笔画道劲，体兼颜、柳，为世所珍。余家尝得南唐后主澄心堂纸，曼卿为余以此纸书其《筹笔驿》诗。诗，曼卿平生所自爱者，至今藏之，号为三绝，真余家宝也。^[23]

石曼卿，即石延年，为北宋年间的著名书法家，范仲淹曾道“延年之笔，颜筋柳骨”。欧阳修此番评价，更是将其书法水平夸赞至“三绝”“家宝”的水平，足以见其鉴赏价值之高。

而对于真迹已散佚的诗人来说，文献中对其书法的记录，则更有利于后人理解其笔法的精妙，判断其在书法史上的价值。陆游《老学庵笔记》云：

伯筠（慎东美）工书，王逢原赠之诗，极称其笔法，有曰：“铁索急缠蛟龙僵。”盖言其老劲也。东坡见其题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箴束枯骨耳。”伯筠闻之，笑曰：“此意逢原已道了。”今惟丹阳有《戴叔伦碑》，是其遗迹。^{[8]35-36}

陆游写作时，慎东美之遗迹唯有《戴叔伦碑》，而此帖似已不传，当今世人更难以瞻其真迹。不过，我们仍可以从宋代文人的评价中观其书法之特点。北宋著名诗人王令作《赠慎东美伯筠》，云伯筠之字“人传书槩莫对当，破卵惊出鸾凤翔。间或老笔不肯屈，铁索缚急蛟龙僵”。而苏轼虽蔑该字为“箴束枯骨”，却也道出了慎东美书法瘦硬、老劲之品格，不过是与王令相比，语言一俚白、一诗化罢了。

（二）可观人品

苏轼云：“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睚眦侧媚之态。”^[24]可见，古人认为，人之道德品质可从笔迹中显现出来。观其真迹，亦可知其为人。因此，除对书体笔法、结构本身进行评价外，文人还常将笔迹与唐宋诗人之人品联系在一起。洪大容《湛轩日记》载：

彭曰：“曾见文天祥真迹乎？”余曰：“未见。”彭曰：“看笔法，亦可见文丞相

正气。”^[25]

作为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的崇高气节数百年来始终为后人所称赞。与洪大容交谈的彭姓翰林,通过真迹之笔法,就可感受到文天祥的凛然正气。今人若见文天祥字迹,亦可从遒劲爽利的书法中,体会其宁折不弯之品行。

诗作真迹,还可以反映出创作者当时的情绪状态。费衮《梁溪漫志》记载了欧阳修对苏舜钦《与欧阳公书》的评语:

予近见子美墨迹一卷,皆自书其所作诗,行草烂然,龙蛇飞动,其中有《独酌》一诗云:“一酌浇肠俗虑奔,醵微鯈大岂堪论。楚灵当日能知此,肯入沧江作旅魂。”卷尾题云:“庆历乙酉十月书于姑苏驿舍。”考其时,盖是被罪之明年居沧浪时所书,其诗语闲放旷达如此,或谓流落幽忧以终,非也。^[26]

苏舜钦居沧浪(在苏州)时,以行草书其诗,不仅诗语旷达,字迹也光朗豪放,颇具鉴赏价值。欧阳修正是以其笔画“龙蛇飞动”,证其被罪后心态豁达,非“幽忧以终”之人。

(三)可彰名臣

书法作品可抒发作者之胸怀,亦可陶冶观者之情操。当触人心弦的字迹出现在山林寺馆之中,笔墨与景观融为一体,可为景致增添新的意趣。

北宋僧人文莹《湘山野录》:

余顷与陵叔华郎中景阳登襄阳东津寺阁,凌博雅君子也,蔡君谟、吴春卿皆昔师之,素称翰墨之妙。时寺阁有旧题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馀,其体类颜而逸,势格清美,无一点俗气,其语数句,又简而有法。……止吾二人者徘徊玩

之,不忍去。^[27]

此二十九字,字字势格清美、飘逸雅致,其内容又简而有法,可为称赞。正是这无名之人留下的超逸脱俗之墨迹,让一间普通的寺庙,有了可徘徊玩赏的价值。真迹在景观宣传方面所发挥的价值,更不仅仅在于笔墨之精妙。如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一载:

澧阳道傍有甘泉寺,因莱公、丁谓曾留行记,从而题咏者甚众,碑牌满屋。^[28]

寇准、丁谓,皆是北宋年间盛极一时的人物。因二位在澧阳道旁的甘泉寺留有行记,旁人为追随此真迹,争相探访,和诗题咏者甚多,甚至达到了“碑牌满屋”的程度。现实生活中,人们出于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努力寻找可以学习、模仿的范型,而范型的对象化便催生了名人效应。正因为此,英雄崇拜、偶像崇拜抑或明星崇拜就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29]民众为追寻名士足迹,亲自探访其所留笔墨之处,也恰是“名人效应”在唐宋时的体现。这些“墨宝”与寺庙景观相辅相成,成为了值得被史册书写的“名胜”。

四、结语

唐宋诗人真迹传至今日,皆十分珍贵,常人难得一见,且文物爱好者、研究者收得诗文真迹,多用于珍藏、鉴赏,而较少分析其校勘、史料方面的价值。然唐宋诗人著作颇丰,其真迹可为当时多人所见、所记。这类对唐宋诗真迹的记载,可从另一种角度重塑诗人创作环境,为今世之唐宋诗研究提供更为直观的材料。因此,真迹相关的记载,无论是在校勘、辑佚、史料收集,还是在书法、人品确证等诸多方面,都是重要的证据来源。对于其他文学类型,文献所记之真迹,亦可为其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帮助,对此也需多加留心,以便获得更多研究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 [1] 张显成. 论简帛的文献学研究价值[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5(1): 34-40.
- [2] 龚延明. 宋代真迹官告文书的解读与研究: 以首次面世的司马伋吕祖谦真迹官告为中心[J]. 中华文史论丛, 2016(1): 165-198, 402-403.
- [3] 王峰. 《容庚藏帖》的文献史料价值[J]. 书法, 2021(3): 142-147.

- [4] 吴聿. 观林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5] 苏轼. 苏东坡全集[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6: 575-576.
- [6] 袁文. 瓮牖闲评[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47.
- [7] 李壁. 王荆公诗注[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零六册.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2.
- [8] 陆游. 老学庵笔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9] 黄磬. 山谷年谱[M]//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第一一一三册. 台北: 台湾世界书局, 1985.
- [10] 叶梦得. 石林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17.
- [11] 葛立方. 韵语阳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5-26.
- [12] 孟宗宝. 洞霄诗集[M]//诸儒奥论策学统宗前集.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18.
- [13] 陈岩肖. 庚溪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6.
- [14] 周密. 浩然斋雅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0.
- [15] 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
- [16] 沈括. 梦溪笔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59-160.
- [17] 李押. 燕行记事[M]//燕行录全集: 第五十二册. 韩国: 东国大学出版社, 2001: 118.
- [18] 林基中. 并世集[M]//燕行录全集: 第六十册. 韩国: 东国大学出版社, 2001: 92.
- [19] 周紫芝. 竹坡诗话[M]. 中华书局, 1985: 12.
- [20] 张邦基. 墨庄漫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74.
- [21] 周晶晶. 黄庭坚书法用笔及相关问题研究[J]. 思维与智慧, 2021(12): 11-13.
- [22] 贺柳. 浅析黄庭坚《松风阁诗帖》[J]. 艺术家, 2021(4): 148-149.
- [23] 欧阳修. 六一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81.
- [24] 孔凡礼.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206.
- [25] 洪大容. 湛轩日记[M]//燕行录全集: 第四十二册. 首尔: 东国大学出版社, 2001: 13.
- [26] 费衎. 梁溪漫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73.
- [27] 文莹. 湘山野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24.
- [28] 魏庆之. 诗人玉屑[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241.
- [29] 刘绍庭. “名人效应”论[J]. 中国广告, 2000(3): 86-88.

(责任编辑: 王圆圆)